

宋庆龄与毛泽东晚年不为人知的矛盾

宋庆龄和毛泽东都出生于1893年，新中国成立初期他们都是年近六旬的人了。此后，在一些重大事件上，宋庆龄与毛泽东走得越来越远。

被批代表资本家说话

1953年，毛泽东宣布过渡时期总路线，试图绕过中共早已决定实施的新民主主义，急剧转入社会主义，变人民民主专政为无产阶级专政，并通过公私合营变私有为维国有。宋庆龄写信给中共中央，直指决策的谬误：

我很不理解提出对工商业的改造，共产党曾向工商业许下长期共存、保障工商业利益的诺言。这样一来，不是变成自食其言了吗？资本家已经对共产党的政策产生了怀疑和恐惧，不少人后悔和抱怨。

毛泽东看到后，批示说：“宋副委员长有意见，要代表资本家讲话。”不过，这时毛泽东仍与宋庆龄来往密切。1956年元旦，毛泽东收到宋庆龄寄来的贺年片后，还提笔给宋写了封信：“亲爱的大姐：贺年片早已收到，甚为高兴，深致感谢

……你好吗？睡眠尚好吧？我仍如旧，七分能吃，十分能睡。”

“我们同她是不同阶级”

1957年，毛泽东号召党外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大鸣大放批评共产党员，以求造成一个活泼和谐的社会氛围。几个月后，毛泽东却又下令由整风转向反“右”，55万人被打成“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宋庆龄时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反右斗争开始两个月后，她就写信给中共中央：

党中央号召大鸣大放，怎么又收了？共产党不怕国民党八百万大军，不怕美帝国主义，怎么会担心人民推翻党的领导 and 人民政府？共产党要敢于接受各界人士的批评……我很不理解这个运动，我想了两个月，还是想不通：有这么多党内党外纯粹的人会站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对立面？要推翻共产党？

由于不喜宋庆龄做法，1959年，毛泽东在“宋庆龄出任国家副主席”一事上投了反对票，认定宋是“民主革命时期的同路人，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她和我们就

走不到一起了……我们同她是不同阶级”。不过，由于多数人赞成，宋仍当上了副主席。

“文革”中父母坟墓被夷平

“文革”到来后，宋庆龄感到震惊，她和她的家族也受到牵连。孙中山被诬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老祖宗”，他在南京的铜像被移走；宋庆龄父母的坟墓也被挖掘夷平。

宋庆龄奋起抗争。为防不测，她亲手焚烧大量资料和书信，转移了她心爱的孙中山画像和艺术品。造反者企图冲击宋庆龄寓所，并扬言要剪掉她的发髻，她断然表示：“我不要剪头发。”毛泽东派江青专程向她解释“文革”形势，她说：“对红卫兵的行动应该有所控制，不应伤害无辜。”她还撰写长文纪念孙中山百年诞辰，回击造反者的诬蔑。

毛泽东要宋庆龄出国遭拒

尽管在“文革”中自身处境艰难，但宋庆龄却不顾安危，尽一切可能保护关心着同样身处逆境的人。在刘少奇被批斗时，宋庆龄对朋友说：“对刘少奇这样

的老革命家，怎么可以这样对待呢？”她还接连给毛泽东和党中央写了7封信，表达对“文革”的不解，并严正声明：

一夜天下来，一些和我一起工作的同事都变成了走资派、反党集团、野心家、牛鬼蛇神。中央要我学习批判刘少奇，我不会做的。刘少奇主席在党中央工作了三四十年，今天会是叛徒、内奸？！我不相信，一个叛徒内奸当了七年的国家主席。现在宪法还有效吗？怎么可以乱抓人、乱斗人、逼死人？

不过，毛泽东这时已容不得宋庆龄，他对周恩来说，“她不愿意看到今天的变化，可以到海峡对岸，可以去香港、去外国，我不挽留”，并指示周恩来、李先念把他的话传达给宋。传达时，他们说：“主席很关心你，知道你的心情不怎么好，建议你到外面散散心。”宋说：“是否嫌我还在？我的一生还是要在块土地上，走完最后几步。”此后多年，宋庆龄很少公开露面，她对身边工作人员说“我不愿意被人当摆设”。

《快乐老人报》2013.11.4

为安利站台的人

2012年12月8日，北京最低气温零下9℃，最高气温零下3℃，风力5至6级。杨全发吃过早午饭，11点就住五棵松体育馆那边赶。刚从地铁出来，好多人就围上来问：“有票吗？”

黄牛们要倒卖的，是安利北京区年会的票。

这是杨全发第一次参加安利年会。实际上，直到两个月之前，他还是望京某家餐馆里的服务员。2007年从蒙自来京之后，他孤身一人，辗转换过几家餐厅。

11月某天，他在手机上用微信“摇一摇”跟一个大姐聊了起来，后来的情景就像那个有名的段子：

去年（2011）是刘翔；今年（2012）是孙杨。

12月8日那天，杨全发就坐在那个对他说“听说过安利么”的崔大姐旁边，手里捏着那张票面价值60元的票。

他不知道，场馆外已有黄牛把票价炒到了500元。

什么都是“恢弘霸气”的

五棵松体育馆能容纳18000名观众。除了距离舞台最远处的几排有零星的空位之外，其他地方都坐满了人：陌生的面孔，然而显露着一样兴奋的表情。

而上传年会视频的那些人，有的则会在标题中用“恢弘霸气”这样的字眼——歌舞是恢弘霸气的，董事长讲话是恢弘霸气的，表彰新晋营销精英也是恢弘霸气的……

“对了，我还记得有孙杨，”杨全发开始慢慢想起来了，“他说他从8岁就开始吃纽崔莱，蛋白粉，维生素、钙片，一直坚持了13年。”

“我能取得今天的成绩……”孙杨说，“我相信这个奖牌里面，有你们安利每一个人的力量，谢谢。”

再接着，主持人把中国奥委会的一个官员请上了台，官员介绍了与安利公司继续合作的情况和愿景，最后说一句：“孙杨是吃着安利走上奥运领奖台的！”

2011年此时，站在台上的人是：刘翔。

杨全发看什么都觉得新鲜热闹，“你要想着，不做安利之后，还有源源不断的收入。”崔大姐说，“这就像是织毛衣，又像修高速公路，你把路修好了，以后钱就源源不断地进来。”

比起平时举办的学习、培训、会议，公司的年会当然远为“隆重大气”，但总结而言，两者并无本质区别：“直销企业的文化是会议文化”。“人都是环境的产物，每个人都需要鼓励，”崔大姐说，“主持人不需要挑逗，大家情不自禁地就会去鼓掌，会被传染。”

彼此尊重，不分贫富

年会结束后，杨全发会不时翻出手机里的视频，重温一下安利董事长史提夫·温安洛的讲话。他记住了其中一个例子：在很多战火纷飞的国家，安利会从美国把钱直接带给当地的直销人员。“这说明了，安利是永远不会放弃这些伙伴的。”杨全发说。

他觉得，年会上的那些人，都是“同道中人”，彼此尊重，不分贫富，“在外面，有很多人瞧不起像我这样的人，”杨全发说，“真的。”

《南方都市报》2013.11.6文/曹飞跃



1949年，美国《生活》画刊所发阎锡山与毒药合影

回望1930年中原大战之前的阎锡山，在中国何其显赫与重要！当中原大战爆发时，美国TIME(《时代》周刊)选择阎锡山作为封面人物，突出报道的正是他多年来统治山西的政绩和长期保持中立的策略。《时代》周刊写道：

作为山西省的“模范督军”，阎实际上耸立在一个独立王国之中（在中国包围

阎锡山：最值得研究的民国军阀

之中)。目前，尽管晋西南地区还存在粮食短缺，但阎为一千一百万人带来了繁荣，在中国他们最为富裕，因而，这使他显得出类拔萃。他的嗜好不是女人、酒、鸦片，甚至也不是金钱，而是优质的道路、纺织、防御部队、维持秩序的警察，发展优良的牛、马、耕具、家禽、肥料——所有能为他的乡亲直接带来好处的事物。《时代》，1930年5月19日）

这一报道并非虚言。客观地看，在中华民国成立之后头二十年的中国，阎锡山对山西的统治和奉行的中立策略，的确为山西带来了稳定与繁荣。

阎锡山对农业发展高度重视。1917年，阎锡山提出三事六政：种棉、造林、牧畜；禁烟、天足、剪发、水利、

种树、蚕桑，三事六政相辅而行。

修公路、铁路，建工厂，山西形成了自己的近代工业体系。

山西的教育，当时也在全国领先。山西早就实行了国民义务教育，到1916年，山西每名国民中有小学生二百九十人，居全国各省之首。

然而，阎锡山的落败恰恰在于他改变了独立、中立的既定方针，贸然决定，走出山西，与蒋介石相抗衡。

1949年，当国民党政权在大陆崩溃之际，阎锡山一度又成为引人注目的对象，则是因为他的“太原守城战”。此时，《时代》周刊的姊妹刊《生活》画刊发表过一张阎锡山照片。红色军队兵临城下时，阎锡山一身戎装，坐在太原的指挥部书桌

旁，桌上分别摆着美国“飞虎队”陈纳德将军大幅照片和马歇尔将军的小幅照片，左手将一盒毒药倒在桌上，面对镜头他特意表露出凝重而又决断的神情。《生活》的通讯即写道：阎锡山决心已定，要与部下死守到底，与太原城共存亡。随后的情况是，他飞离了太原，而他的五百名部下，包括亲人在内，在红色军队攻进太原城之后，集体吞药自尽，即阳明山故居前碑文所写“太原五百完人”一事。

一年之后，落败来到台湾的阎锡山，彻底离开政坛。他的新建住所选在台北远郊的山间，他在落寞中，在被世人淡忘、被时间过滤状态下，走完生命最后十年。

《国家人文历史》2013.10.18文/李辉

8岁的游击队长

11月2日，美联社一篇有关缅甸原“上帝军”双胞胎兄弟在泰国重聚的报道勾起了人们对十多年前那段历史的回忆。两兄弟的传奇故事，以及他们分离后不同的人生轨迹令人唏嘘不已。

据美联社报道，9月26日，原“上帝军”双胞胎两兄弟在泰国西部北碧府桑卡那武里县的一个餐馆里重逢，弟弟卢瑟·托还将兄弟二人的照片分享在网络上。在其中的一张照片中，弟弟卢瑟身穿黑色T恤，打扮时髦，两个耳朵上戴着耳环。而留在泰缅边境难民营的哥哥约翰尼相貌神情略显沧桑。一年多前，缅甸政府同包括克伦族在内的大部分少数民族武装签署了停火协议，这让已经移居瑞典多年的弟弟卢瑟·托返回缅甸成为可能。

2000年，英国《卫报》记者有关“历史上最年轻的游击队领袖”的报道让卢瑟和约翰尼兄弟声名大噪。在一张广为流传的照片中，身着军服的兄弟被游击队员簇拥在中间，弟弟卢瑟正抽着一根烟，神情显得从容而成熟，而哥哥约翰尼在他的背后，显得有些羞涩。事实上，从1997年开始，两位时年仅8岁的克伦族少年已经开始领导一支有上百人的游击武装，并同缅甸政府军作战。当年1月，缅甸政府军对



缅甸上帝军双胞胎兄弟

少数民族武装“克盟”及克伦族村寨展开大规模清剿。克伦民族武装第四旅在政府军的强大攻势下溃不成军，而克伦族村寨里的孪生兄弟卢瑟和约翰尼却表现得镇定自若，他们不仅勇猛作战，还高声喝令慌不择路的逃兵重整旗鼓，进行反击，而那些逃兵居然真的稳住了阵脚，并在两个小孩的指挥下发起反扑。最后，他们竟奇迹般地击退政府军，反败为胜。

此战之后，克伦族游击队员将这两个还不满10岁的双胞胎兄弟奉若神明，并甘愿投靠到他们麾下。而两兄弟也脱离克伦民族武装成立了“上帝军”。

不过，“上帝军”的反抗没有持续太久，2001年两兄弟率领陷入困境的“上帝军”向泰国政府投降。投降后，



8岁时的双胞胎兄弟

他们先是被安置在泰国与缅甸边境的难民营中。2006年，缅甸国家电视台播放了约翰尼和他的8名“上帝军”成员向缅甸政府投诚的视频。不过，卢瑟后来表示，真相是缅甸政府以提供工作作为借口诱骗了约翰尼，投诚的视频都是政府导演的，“他们穿的军服以及交出的武器都不属于他们”，卢瑟说。

自此之后，两兄弟走上了不同的人生道路。居住在难民营中的卢瑟，通过联合国难民署“第三国安置计划”，最终移民瑞典，他在那里接受教育，并结婚生子。卢瑟的母亲和姐妹也被安置在新西兰。多年后，约翰尼则又回到泰缅边境的难民营中。目前，卢瑟正在努力让哥哥约翰尼能够前往新西兰，同自己的母亲和姐妹们团圆。

《环球时报》2013.11.13文/于景浩